

# 建造常识：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毕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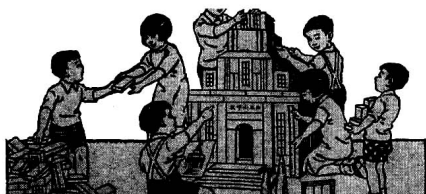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建造常识：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毕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毕苑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34-5418-0

I. ①建… II. ①毕… III. ①教材—教育史—研究—  
中国—近代②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423.3②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423 号

装帧设计 季凯闻  
责任编辑 林冠珍  
责任校对 刘世新

##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毕苑 著

---

|      |                                                                 |
|------|-----------------------------------------------------------------|
| 出版发行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br>福建教育出版社<br>(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
| 出版人  | 黄旭                                                              |
| 发行热线 | 0591—83752790                                                   |
| 印刷   |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br>(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
| 开本   | 720 mm×1000 mm 1/16                                             |
| 印张   | 22                                                              |
| 字数   | 315 千                                                           |
| 插页   | 2                                                               |
| 版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334-5418-0                                          |
| 定价   | 45.00                                                           |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 序

郑师渠

教科书源自西方。近代西方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对于大量新型人才的需求，先是出现了近代学校，进而又有了适应集体教学需要的教科书。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出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手，国人自编教科书要晚到 19 世纪 80 年代。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又是得益于三种进步力量的良好互动。一是近代新的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时代的大平台。1903 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统一全国学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辅以实业和师范学堂的教育体系。它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后为民国所继承，影响至今。这是国家制度层面提供的时代大平台；二是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强有力的编纂队伍的推动。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王云五、胡适、丁文江、任鸿隽、黎锦熙、刘海粟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近代著名学者与新文化代表人物，都曾投身其间，形成了强有力的编纂队伍。他们开荆辟莽，发凡起例，成为了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新兴出版业的热心投入。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为代表，近代新兴出版业，不仅多以出版教科书起家，而且其领导人作为现代的出版家，也多目光远大，负有使命感。1912 年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中说：立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sup>①</sup>。他

---

<sup>①</sup> 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第 421 页。

们将出版教科书视为教育救国事业的重要内容，故乐于投入，并诚心诚意地将许多优秀的学者团结在各自的周围，成为了推动教科书事业发展重要的组织力量。要言之，从总体上看，是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与出版家，应时代社会的需求，同心协力，使我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在国衰民穷的困难条件下，不仅适应了独有的国情，而且保持了很高的品位，从而助益了国家教育的事业，厥功至伟。

近代出版的教科书（主要指中小学与中等职业学校用书）总数有多少，缺乏准确统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各类教科书最为丰富，居全国之冠。据本人所知，其中，仅国文科就约有500种，历史科约300多种。其全国的总数一定是可观的。由于教科书数量大、覆盖的学科面广、编纂出版一般都较为规范，在今天它自然成为了我们藉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十分珍贵的资料，原因在于：教科书是国民教育的重要载体，缘其所构建的塑造国民品格应具备的包括文理各学科基本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体现了晚清民国近代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国家意志和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教科书就是研究近代国民成长史。此其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跌宕起伏，思想文化和观念的变迁更为急剧，教科书深刻地反映和浓缩了这一时代变幻的风云，成为人们透视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1904年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还不能没有尊君保大清的内容，故称满洲兴起为“满洲龙兴”，称清朝的建立则叫“大清定鼎”。但到清政府覆亡，随后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则变为指斥清朝专制，而颂扬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了，固然是反映了这一点；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教科书渐次改为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同样也是反映了这一点。此其二；教科书的编纂不能不及时吸纳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它从一个侧面，又很好地反映了近代学术的发展。以史学为例，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提倡“史界革命”。此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无不强调“略古详今”和“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新史学观念的影响，显而易见。晚清历史教科书受学界的影响，也曾盲目照搬西方学者的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但民国后，随着学界纠

正了这一错误的学术观点，新的历史教科书也相应对此作了删除。教科书之反映学科与学术的发展，于此可见一斑。也惟其如此，教科书的研究不仅仅属于教育史研究的范畴，它实与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学术的转型远为广阔的语境相联系。换言之，教科书的研究有着更加宏富的内涵和广阔的空间，其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性意义，不言自明。这也是新时期以来，教科书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且其成果迭出的原因所在了。

毕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博期间，充分利用校图书馆的资料优势，确定以研究教科书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书正是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它将教科书置于近代文化视野下作系统考察，涉及了近代教科书的缘起与发展、教科书与中外文化、近代教科书的审查制度等广泛的领域。作者用力甚勤，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学界已有的研究。如前所述，教科书研究有着宏富的内涵与广阔的空间，相信作者可以更上一层楼。

2010年5月17日

# 建造常识：近代教科书的文化价值

在史学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等人看来，学校象征了一个社会的集体梦想<sup>①</sup>。其实，教科书更像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寄托。不论是国家权力机制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这种形式塑造理想的未来民众。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国儿童以“三百千”或“四书”等作为开蒙读物。这些典籍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在蒙童心中种下知识的种子，培育道德的萌芽。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从“三百千”到“教科书”，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今天习以为常、陪伴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的教科书是怎样诞生的？它们当初有些什么样的课文？这就是本研究关注所在。

这个时代开始于晚清。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传统秩序面临着分崩解体的危险，社会文化接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教育和所有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处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改造、链接阶段。戊戌维新后，中国教育开始迈出近代化的步伐——近代教育制度确立，学校教育成为基础教育的主体。而中小学教科书是最能体现中国教育制度化的一个载体，它与思想文化史自然接界，不仅反映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也记载了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丰富内容。在此我们首先对教科书研究做一学术史的梳理。

---

<sup>①</sup>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it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0.

## 学术史与资料状况

教科书从诞生起，它的重要性就被当时的社会文化精英所重视。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新式教育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发酵。笔者赴英访学交流期间，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OAS，University of London）查阅到一些英文档案，其中包括 *The Chinese Recorder*，它是对中国教科书的诞生有极重要作用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机关刊物，顾长声先生译之为《教务杂志》，称它是“基督教的喉舌”<sup>①</sup>，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教科书在中国的早期情况十分重要。此时期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教育，所留下的一些教育统计资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参考<sup>②</sup>。中国知识分子则把编写新式教科书作为改良中国文化的利器，近代教科书开始欣欣向荣地诞生、涌现。

整个民国时期，尤其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无论是研究性著作还是资料汇编都远非晚清时期可比。就涉及教科书方面的内容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探讨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的著作。民国时期以“小学教材研究”为名的就有如下几种：

吴研因、吴增芥同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

朱翊新编，上海世界书局，1933 年；

张钰编撰，北京文化书社，1932 年；

吴宗望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

此外还有：

周予同等著，《教材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年；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53 页。

② 例如清学部编，《初等小学教授细目》，清宣统二年（1909 年），学部图书局石印。直隶学务公所总务课编，《（丁未全年）直隶教育统计表图》，北洋官报总局铅印，1908 年。清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份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等。



朱杨、俞子夷同撰,《新小学教材研究》,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

俞子夷、朱杨合编,《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上海儿童书局,1947年;

张宗麟编,《乡村小学教材研究》,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

陆静山主编,《最新小学补充教材丛书》,上海华华书店;

俞子夷编著,《简易师范学校及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上海正中书局,1936年;

李清悚编著,《乡村师范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

现代教学社编辑,《小学教科书的改革》,上海华华书店,1948年。

这些著作都是教育学类著作。以吴研因、吴增芥同编的《小学教材研究》为代表,著作通论小学教材的范围、类别、来源及编制标准等,认为“举凡民族中之思想、情感、知识、习惯、技能等”,都是小学教材应当汲取的对象。他们批评知识教材、技能教材或工具教材、实质教材这样的分类,而把小学教材分为思考的教材、练习的教材、发表的教材和欣赏的教材。他们还认为,小学教材在编制体例上要排列清楚,要有纲要和索引,要前后联络,还要指示课外读本和参考书。在分论部分,作者将小学国语科、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等科目逐一论述,就各类教材的范围、性质、取材、特点和价值等,结合时代要求,提出自己的见解。朱翊新的同名著作在编排思路上也大体与此相似。

除了通论性的教材研究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单科教材研究。比如: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主编,《国语科教材及教学法》,1940年;

袁公为著,《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李慎言编,《中学国语补充教材》,北平北新书局,1934年等。

还有一些乡土教材研究著作,如:

王骧编,《乡土教材研究》,上海新亚书店,1936年;

王伯昂编著,《乡土教材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等。

二、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料汇编中,保留了一些有关普通教育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最典型的的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的两次教育年鉴。《第一次

《中国教育年鉴》由开明书店出版于1934年。在其戊编“教育杂录”中，专立一节“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较详细地说明了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科书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其论述重点在于教科书的刊本情况。《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是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这次年鉴中有关教科书的资料就比较零星，只相对详细地说明了中学教材的编印概况，并收录了一些中小学教科用书的编审统计数据。个人完成的有关教科书的资料性汇编并不多见，可见的如汪祥庆编，《中等学校各科教学用书调查报告》，1936年北平华北基督教教育协会出版。

三、除了有关教科书的著作资料汇编外，还有一类资料对于本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有关教科书的法令法规。这类资料散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种官报、杂志及期刊。比如《学部官报》（1906.8~1911），作为学部编辑发行的我国早期的教育行政公报，它收录了有关的谕旨、章奏、文牍及译著。学部有关教科书的文牍法令，各省报告有关学堂课本的电文，尤其是学部对教科书的审定和批示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直隶教育杂志（直隶教育官报）》（1905.1~1911.10）虽然是直隶一省的教育行政公报，但由于直隶地位之重要，且该杂志中有关教科书的资料有许多是不被《学部官报》收录的，因此资料价值也较大。罗振玉发起创办的《教育世界》（1901.5~1908.1）反映了戊戌维新后中国教育界向日本学习的状态。该杂志“每册前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后附译书。附译之书，约为六类：曰各学科规则，曰各学校法令，曰教育学，曰学校管理法，曰学级教授法，曰各种教科书。教科书分小学级、中学级二者……多采自日本。”<sup>①</sup>创刊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存在时间较长的教育类百科全书型杂志，其主要栏目有社说、记事、主张、评论、教育法令、教授资料、章程文牍、杂纂等等，包含了更丰富的近代教育史料。此外还有存在时间较短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2~11），以及反映地方教育的杂志《教育研究》，该杂志由江苏省教育会编辑发行，

① 罗振玉，《教育世界序例》，《教育世界》第一号，1901年5月。

一些诸如乡土教育的史料可以在其中得到反映。

应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史料是丰富且成系统的。1949年以后，教育研究的成果首先表现在对有关史料的汇集整理上。1950年代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补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中华书局出版）从出版史角度保存了一些教科书方面的史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中国教育史研究都较为沉寂，只有张志公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等零星成果。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多贺秋五郎著《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和《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篇上中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这两种资料搜选细致、体例清晰，是本研究很好的参考。

1980年代后，中国教育史研究走向繁荣，涌现了一大批教育史类著作，以“教育史”、“教育通史”、“教育简史”、“教育史纲”等命名的著作就不下十数种，不过这类著作对教科书没有足够的注意。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教育史研究走向微观化，教科书开始被研究者关注。例如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八章第三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专门论述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洋学堂的情况，阐释其教科书编辑的方针等问题。叶健馨著《抗战前中国中等教育之研究：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专门论述“教科用书的编订”，大致描述了1930年代编辑和审查教科用书的经过。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专列一章，概要性地论述了清末、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审情况。还有如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亦有专节论述晚清学部的教材编纂与审定。

1980年代以来，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成果丰硕，汇编中对教科书方面的史料也开始关注。如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这几种资料汇编都是多卷本，史料之丰富前所未有。不过这些资料中有关教科书的内

容多零散出现，并非集中收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多卷本连续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其第三辑、第五辑第二编、第三编都将教育作为专门资料集，其中教科书方面的史料较为集中。其他如《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7年），《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目录等资料性著述中收入了有关早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有关教科书的情况。除资料集之外，许多近代文化名人、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以及主持、参与教育工作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有的甚至亲自参加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在其文集中多有论述教科书的文字，因此许多近代学者的文集日记也是宝贵的研究资料。

就1980年代以来教科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而言，更可以看出史学研究视角的拓宽和转变。较早的代表性文章如《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郑逸梅《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2期），《我国近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史略》（颜禾《教育评论》1988年第1期），《关于编印的小学教科书的回忆》（赵季《地方革命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更多起到了发现新视点的作用。1990年代以后教科书研究论文更加细致。如：《略论清末部编教科书及对教科书的审定》（吴洪成《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晚清教科书编辑述论》（里明《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有专门论述某一科目的论文如：《1901～1949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研究》（刘正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7年第8～10期）；还有说明某个机构在教科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的文章如：《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王宏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张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4月）等。另有《中国近代教科书与日本》（徐冰《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等讨论中日教科书纠纷的论文。2003年第4期《历史研究》程美宝的论文《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以广东乡土教材作为分析地方与国家关系

及地方利益集团矛盾冲突的文本，在取材及问题意识上都值得参考。这些论文为宏观把握近代教科书提供了细致丰富的微观视角。

随着研究视角的深入，教科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现已出版了几部此类专著。较早的是熊承涤著《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著作通论了中国学校教材、儿童教材和专科教材，然后分专题论述了从商周、先秦直至清代前期的学校教材。1998年出版的吴洪成著《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了从先秦到整个民国时期，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材，研究领域可谓宽广。不过这样长时段的大主题研究，容易漏掉很多细节问题，影响论述深度。王建军著《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是近代教科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成果。著作论述了“清末教科书的传入”、“清末的自编教科书”和“民国初期的自编教科书”三个主题，勾勒出教科书诞生初期的大致状况。著作研究下限止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分析的教科书以国语修身等为主，资料较为有限。汪家熔著《民族魂——教科书变迁》（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作者积多年功力，史料发掘细致，内容丰富，有出版史特色。这几部开拓性著作对后学有很大参考价值。

还有一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不直接以“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但利用了部分近代教科书，对本研究有不少帮助。比如吕达著《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王伦信著《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郑国民著《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学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2001年郑航的博士论文：《近代文化变迁与学校德育改革：1902～1927年间中国中小学德育课程之研究》等，这些研究在历史学、教育学多重方法的使用上，在资料挖掘、问题分析等方面，都对本研究有不少启发。

笔者关注近代教科书研究已有数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收藏近代教科书的宝地多有收获。尤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清末至1949年出版的师范学校与中小学普通课程的标

准、教科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参考书 2616 种，馆藏中小学教材科目包括修身、社会、公民、党义、三民主义、国语、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数、自然、常识、卫生、农业、商业、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矿物、植物、动物、生理、经济、美术、音乐、劳作、家事、簿记、体育等数十种门类 6 千多册。无论数量还是科目都较能充分反映近代教科书的面貌。这些珍贵资料构成了本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 研究思路与主要发现

基于前人的成果，本研究致力于发掘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发展与近代文化转型的关联，发掘教科书所展现的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内涵。以下是研究思路 and 主要发现：

“教科书”不是一个既有的概念。光绪 23 年（1897 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以及张相文所著《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等<sup>①</sup>，是可考的近代意义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1901 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认为，统一的“教科之书”是西洋学校教学的一大优点<sup>②</sup>，这可以算是清政府官方公文中第一次使用近代“教科书”概念。这个概念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它的传入与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贡献密不可分。第一章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在中国存在了 13 年，这是一个以宗教教育为目的、以教科书研讨为主要任务的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机构，它同时具有编辑、审定和出版发行等功能。它的主要职能是探讨以教育方式向中国年轻人传播基督教思想，同时亦重视改变中国学生的受教方式，向中国学生输

---

①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第 116 页。

② 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48 辑 47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

出按西方模式编辑而成的“中国教科书”。他们开始在中国传播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其中狄考文的贡献值得肯定。他较早注意到教科书编纂的规则，提出教科书的体例、译名及翻译的“中国化”等问题，希望用西方近代方法改造中国的传统教学模式。他的意见不仅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编辑出版工作定下基调，在当时的中国提出这些思想更是破天荒的。在华传教士对于宗教与科学，语言和文字，教科书的审查出版等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原则进行过很多讨论，他们的工作，启发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近代教科书的产生，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始。教科书翻译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带有洋务色彩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翻译教科书也因为游学和对外交往等原因，经历了两个浪潮：先学欧美，再转为东瀛。这是第二章论述的主要内容。

京师同文馆和各地广方言馆师生翻译了为数不少的西方书籍，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理、政治、法律、天文、历史和英文等多个领域。作为洋务运动产物的江南制造总局，其成立于1868年的翻译馆在翻译西书方面颇有成绩，它的一大贡献是在新名词翻译原则上的探讨。1903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以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为主”<sup>①</sup>，为解决西书翻译紊乱状况、统一教科书翻译进行了有益的制度化尝试。此时期南洋公学等各地新式学堂也纷纷使用翻译教科书。甲午战后形势大转，中国迅速掀起师日浪潮。大批官员赴日考察教育，从日本学校学到了很多可供实施的方法，在教科书编辑出版等具体问题上引进不少经验。关心教育改良的学者如罗振玉等从日本收获甚多。当时中国较大的出版机构都盛行翻译日本教科书，译自日本的教科书占据了当时销售量的不小比例<sup>②</sup>。翻译的日本教科书相对此前的翻译欧美教科书，就学科而言更为广泛、细致，更加符合近代教育体制。

---

① 《奏请京师编译局归并举人梁启超主持片》（1898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9页。

② 参考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如此高涨且务实的师日大潮，给中国近代新教育带来什么影响？这是第三章讨论的问题。

笔者搜罗了 27 类 508 种汉译日本中小学教科书，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认为有三个方面影响较为重要。第一是师日浪潮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第二是汉译日本教科书促成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如地理教科书模仿并形成了“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从“王朝体”向“时代体”过渡等。第三是汉译日本教科书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的建立。这表现在女学、“家事”与师范教育的建立，还有王国维译介日本教育学教科书对中国早期教育学的奠基上。总结认为，汉译日本教科书对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启发有二：其一，帮助中国教育完成了传统教本的转型，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其二，参与翻译校订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学者，很多都是自编教科书的作者，他们修正日本教科书的缺陷，成为中国教科书告别传统教本、走向近代学科体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 第四章论述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和发展。

1903 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蒙学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蒙学教科书”第一次较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可称是“第一部近代教科书”。其后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最新教科书”紧扣新学制，被称为“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sup>①</sup>。它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从官书局和民营书局所见晚清教科书的出版销售概貌，可以看出当时教科书出版、销售和流通的广泛性。本章还论述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概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北洋政府统治初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最具实力的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发行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推动了民初中国教科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19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由于政治文化权力空间相对存在，民间文化活跃，中国教科书发展进入又

---

<sup>①</sup> 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33 页。



一个小高潮。

第五章着力于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

晚清有关教科书编审的意见，大略可分为“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种。前者孙家鼐、张百熙等少数主持教育改革的清廷官员可谓代表，他们的想法反映了制度初建时期的理想设计。在“审定制”问题上又有两类意见。一类主张教科书编写可以相对自由，但是须经学部审定方可使用；另一类强调给民间编写和使用教科书以更多的空间。晚清教科书的编审以190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前期以1902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之设为标志。《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凡各项课本，须遵照京师大学堂编译奏定之本，不得歧异”，基本确立了京师大学堂具有统一编审全国教科书的最高职能。后期可称为学部时期。学部对教科书编纂发行的管理更加具体全面。本章也大致论述了民国前期教科书的编审。北洋政府有关教科书的法令说明，民国初年事实上是允许民间自由编纂教科用书的，惟以教育部加强对教科书使用的审查。只是政局不稳，政府机构工作乏力。国民政府时期，“党化教育”实际成为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审方针，加强了对教学科目的审查。不过教科书编审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稳定，国立编译馆对于教科书编审的制度化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如果说以上五章集中论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的话，那么以后三章则尝试发掘教科书与近代社会文化的关联，探讨教科书展现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内涵。

第六章《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型》，关注近代教科书中对于“理想国民”的理想描述。

其中“修身”教育对于传统的经学教育，在道德教育上有所继承，又有开新。所继承的是“孝”为天下先的观念和其他个人修养。所不同于传统教育之处则在于国家社会观念的培养和政治意识的启蒙。这是近代道德教育转型的表现。我们以林纾及其《修身讲义》为例来分析，即可看出晚清道德转型时期的驳杂情状。1920年代后期“公民”教科书的出现，笔者认为这是教科书史上值得关注之处。这类教科书对于守法、参政、地方自